

海峡两岸论朱熹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海峡两岸论朱熹

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
对中国文化贡献学术会议
论文集

1130—1995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海峡两岸论朱熹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安升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0.87 印张 274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15-1345-3/B·46

定价 19.50 元

嘉禾新岸两期

嘉禾新岸 865 嘉禾新岸

嘉禾新岸 嘉禾新岸

嘉禾新岸

1130-1992

本书承蒙朱祥南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谨致谢忱

嘉禾新岸 嘉禾新岸

在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代序)

郑学檬

海峡两岸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学术会议在武夷山市隆重召开,我代表厦门大学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朱熹是 12 世纪的一个伟人。12 世纪的中国正值南宋前半期,宋金战争带来了深重民族灾难,阶级矛盾激烈,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动荡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令人思考的社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奋起救国救民,刻苦自励,探求真理。

朱熹像其他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从先贤的经典中寻找匡时救弊的微言大义。他八九岁读《孟子》,十三四岁读《论语》,十五六岁读《中庸》,继之则师从刘勉之(致中)、刘子翬(彦冲)、胡宪(原仲),接受二程理学。以后他又受李侗的教导,接受“理一分殊论”、“静坐想工夫”,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跨入二元论色彩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种转变是和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点相联系的。

朱熹在李侗去世之后,学术研究上进入一个新阶段,潜心研究程颐著作,由“静坐想工夫”而居敬、致知,掌握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与认识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去求得精神本体——理,他又把张载的“气说”吸收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来,确立“天地间有理有气”的二元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从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看，他能综合百家而自成一家，在学习继承中创造，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人研究朱熹时，十分重视朱熹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和研究，强调他对自然科学的贡献。中国哲学有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夫之等。朱熹与他们相伯仲，他对张载等人的著作研究甚有心得，他关于“气”的思想可以说直接汲取了张载的学说，只是他主张“理在气先”，陷入客观唯心主义泥坑。他推崇沈括这位大科学家，认为宇宙万物之理，“近代沈括所说，乃为得之”。至少可以肯定，朱熹不鄙薄自然科学，不管天文地理、虫鱼草木都认真研究，唯物之理是求，这种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衡量朱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一个原则是看他比前人提供了多少新思想、新观念，而不是仅仅强调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和还有多少局限性。朱熹建立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提供的新观念、新认识比同时代的人多得多，这是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衡量朱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另一个原则是看他的著书立说与教育的关系。朱熹是文化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人在深山而面向社会，推崇教育，造就人才，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朱熹重视德育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教育是文化的载体，教育是光大优秀文化的阵地。

总之，我们今天纪念朱熹这位先贤，是要学习他综合百家的学习精神、不拘泥师说的创新精神、重视教育的育人精神，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 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新高潮的到来作出贡献。

1995 年 10 月于厦门

目 录

在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对中国文化的	
贡献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代序).....	郑学稼(1)
宋明理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刘鄂培 竺士敏(1)
朱熹与新儒学	高令印(13)
从牟宗三先生的朱子研究探讨朱子思想中	
的现代性	(台湾)唐亦男(22)
论朱熹的人生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郑晓江(37)
困惑中的建构	
——“理一分殊”说的形成及形上拓展	陈进国(59)
朱熹的科学价值观及现代意义	乐爱国(70)
朱熹忠恕观简论	何乃川(77)
朱熹“德刑兼施”政治伦理观探论	吴来苏(83)
从《朱子语类》看朱熹治《春秋》之要领	(台湾)黄志祥(93)
朱熹的孝经学	蔡方鹿(98)
朱熹《易》学的象数倾向及其学术背景.....	王 铁(105)
试谈朱子在《周易》研究中的新探索.....	朱 秩(116)
朱子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	潘立勇(125)
理学与美学札记.....	胡 健(138)
略论朱子“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	
史学观.....	马玉山(147)
朱熹与书院文化.....	黄保万(169)
论朱熹对古代书院制度的贡献.....	张品端(176)

朱熹土地所有权思想简论·····	徐公喜(185)
试论朱熹的养生之理·····	徐学仁(197)
朱熹与戴震·····	方利山(208)
朱熹思想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李锦全(211)
朱熹理学思想对欧州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	程利田(216)
从文化观点探索朱子学术思想的影响·····	(台湾)朱茹辛(229)
从李方子《文公年谱》遗文和《朱子事实》	
看朱门学术之歧异·····	(台湾)朱荣贵(236)
福建文化的发展与闽学的产生·····	黎昕(245)
朱熹闽学学术思想的渊源·····	柯远扬(261)
“伪学之禁”与台谏·····	(台湾)葛绍欧(269)
朱熹与闽学闽东学者群·····	陈遵沂(289)
朱熹刻书事迹考·····	方彦寿(301)
朱熹泉州事迹考·····	林振礼(313)
台湾朱子崇祀·····	(台湾)魏永竹(327)
海峡两岸纪念朱熹诞辰 865 周年暨朱熹对中国文化	
的贡献学术会议综述·····	张品端 方彦寿(331)
编后记·····	编者(342)

宋明理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刘鄂培 竺士敏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公元960—1127年)这160余年里外患频繁,烽烟不熄;人民流离,民生凋蔽,内忧不已。但是,这个国力衰微、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哲学发展的光辉时代,其标志是理学的发生、发展和形成。

一、宋明理学的形成

理学发生于北宋,当时出现了5位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他们对理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称之为“北宋五子”。周敦颐讲学于濂溪,形成了“濂学”学派;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形成了“洛学”学派;张载讲学于关中,形成了“关学”学派;邵雍专治周易,发展了象数学。这5位哲学家对理学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其中,对理学的形成影响最深的是张载的“关学”和程颢、程颐的“洛学”。

宋、元、明、清理学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三个流派:一、张(载)王(夫之)之学。北宋张载建立了“气一元论”哲学体系,经明清两代不断发挥,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总其大成,将“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推上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高峰。二、程(颢)朱(熹)之学,南宋朱熹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以程颐建立的“理一元论”为主体,兼采张载“气”的学说,为中国古代哲学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缜密的哲学体系。三、陆(九渊)王(守仁)之学。南宋陆九渊继

承和发挥北宋程颢重视“心”的思想，创建了“心学”，明王守仁附和，形成陆王“心学”。

以上宋明理学的三个流派，以张王之学、程朱之学为主体。而程朱之学，在元明清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最深。陆王“心学”东传日本，对“明治维新”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在中国，其影响不及张王、程朱之学。

二、现代中国哲学中的“接着讲”

20世纪50年代初，当大陆学者热衷于阅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时候，不免产生一个疑窦：中国古典的哲学——宋明理学，是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命运一样走到了“终结”？中国古典的理学是否被作为“陈列品”送进“博物馆”？或密藏于图书馆的书库之中，以供“猎奇者”抒发“思古之幽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以铁一般的事实消除了上述疑窦。中国古典的理学并没有送进博物馆，也没密藏于图书馆。在现实的哲学中，这个建立于8个世纪之前的理学，并没有“死”，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如张岱年先生，今已年高八十六，仍笔耕不辍。他称他的哲学思想是继承张王之学，在新的历史时代中“接着讲”。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先生在几年之前都已作古。冯先生在生前曾说，他的哲学思想是继承程朱之学，在新的历史时代中“接着讲”。贺麟^①先生是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尤精于黑格尔哲学，但是他在中国哲学上，亦可以说是继承于陆王之学，在新的

^①在贺麟先生的哲学体系中以“逻辑的心”、“理性的心”为出发点。他认为：“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31页）“心即理也”是陆王心学的重要命题，亦即贺麟先生哲学中的“逻辑的心”、“理性的心”。

历史时代中“接着讲”。

宋明理学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并没有随历史的更新而泯灭，三个流派都后继有人。中国现代哲学的先辈们以辛勤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脉”不致中断，这是值得庆幸的。他们的建树在中国哲学史上永不可磨灭。

三位中国现代哲学的先辈，在继承宋明理学上虽各有所宗，但在方法上“接着讲”却一致。什么是“接着讲”？这是本文待讨论的重要问题。冯友兰先生在生前对这一问题论述较详。冯先生说：“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①

“接着”讲和“照着”讲，仅一字之差，却有本质的不同。“照着”讲，是不顾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新，死捧着前人的教条，奉之为圭臬，这是一种教条式的、保守的历史文化观。而“接着”讲则是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不同，以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哲学思想，建立一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哲学。这是一种反教条的、进步的历史文化观，与唯物史观一致。

由于宋明理学的主体为张王之学和程朱之学，下文就这两个学派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张岱年先生与张王之学

张岱年先生推崇张载和王夫之的哲学，他写过《张横渠的哲学》、《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②张自称，他的哲学继承于张王之学，并“接着讲”。

^①冯友兰：《新理学》绪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②均收入《张岱年文集》第4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一)张王之学——“气一元论”哲学

“气”是中国哲学中古老的概念。在《管子》书中有“精气”说，《心术下》篇云：“其精气之极也，一气能变曰精。”《内业》篇云：“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构成人和世界的基本粒子。《内业》篇又说：“凡物之精以此为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精气”之说对中国古代哲学有重大影响，唯物的哲学流派多以“气”作为基本哲学范畴。北宋张载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气一元论”哲学体系。

张载的哲学认为，宇宙这个寥廓的空间（“太虚”）是无形的，但是它不是“真空”，而是充满了“气”。“气”有聚有散，聚之而成万物，散之而复归于太虚。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张载说：“太和所谓道。”“气”有聚有散，运动变化，阳阳消长，保持和谐的最佳状态。“道”即为宇宙中“气”的变化流行的宏大历程，他说：“由气化，有道之名。”而这个“气化”的历程又是有规律的，亦称之为“理”。张载说：“万物皆有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①但是，“顺而不妄”的“理”是存在于事物之外，或存在于事物之中？张载认为“理不在人而在物”^②，“理”是物之理，它存在于客观的物之中。

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以注释张载《正蒙》一书来阐发自己的哲学。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③张载谈唯“气”，而王夫之谈唯“器”。“器”是“气”之

①《张载集》，《正蒙·太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

②《张载集·语录上》。

③王夫之：《周易外传》。

聚,张、王之学同属唯物论。

张王之学在清代的影响很深。稍晚于王夫之,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清中期有戴震,他们的哲学思想都与张王之学一脉相承。

(二)张岱年先生的“接着讲”

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完成于1942—1944年,包括《哲学思维》、《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凡五篇,合称为“天人五论”^①。在《事理论》中张岱年先生对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主要范畴:实有与存在、理、物等都作了明确的界说。他说:

实有是有征验之有,即可由经验而断定其独立之有。是故实有仅有二类:(一)个别感相之个别的外在所待;(二)个别感相共有之恒常的外在所待。前者谓之“事”与“物”,后者谓之“理”与“性”。

实有、凡有,亦皆可谓之存在。

张先生认为,实有和过去以及现在一切的有(凡有),都是存在。它是可由经验所证实、独立于主体之外、客观存在的有。它包括两类:(一)“事”、“物”,即指可由认识而获得个别“感相”^②的那些个别的外在存在(或实有)。(二)“理”、“性”,即指可由人认识而获得个别“感相”的那些为事物所共有的永恒不变的外在存在(或实有)。从以上分析,可见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是唯物的,而且与辩证唯物论一致。

张岱年先生还分析“物体的层次”,他说:

物体有二:一单体,二兼体。单体即内中不含物体之物体。

兼体即内中含有物体之物体,即由较小之物体构成之物体。

^①收入《张岱年文集》第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相”,张岱年先生认为“实有中之可注意者谓之‘相’。”即一切客观存在所具有的不同征相,包括:广与延、异与同、变与常。“感相”,是从认识而谈,认识的主体通过感官与被认识客体接触而获得的“相”,称为“感相”。“所待”,指认识中,被认识的客体。

单体即最微之物，可谓之微质。

张先生区分“单体”、“兼体”，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中“气”这个范畴。他说：

指最微质之每一个而言，谓之微质；指众多最微质或一切最微质之总和而言，即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气。中国哲学中的所谓气，即指无数的单体。所谓气聚为物、物散为气，即是单体结聚为兼体，兼体分解为单体。

由上可见，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继承了张王之学。尤为可贵的，是张先生运用现代西方逻辑分析方法，对“气”这一古老的范畴作了严密的逻辑分析。

在“理”“道”与“事”“物”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上，张先生作了精湛的分析：

凡变中之常谓之理。

“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变者”（“常”），又称之为“共相”：

事与事有异，相异之事，成为多事，吾所相遇之事，不仅一事而为多事。如仅有一事，则无所谓同异，无所谓变常。有多事，然后有同异然后有变常。理为事事相续中之恒常，多事同有之共通。是故理曰常相，亦曰共相。

作为事物“共相”的“理”，其与事物的关系是：

此诸事共此常，即此理显于此诸事；彼诸事共有彼常，即彼理显于彼诸事。

“理”显于事物之中，即“理”是事物之“理”，因此，理与事的关系应是“理在事中”。

“道”与“理”同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张岱年先生论证了“道”和“理”在层次之不同，同时论证了“道”与事物的关系：

永显的恒常，谓之道，亦曰至理。道无所不在，为一切事物

所共有之恒常。

道为永显恒常，故为最究竟之理，而未尝离于事。道统涵一切事与理。^①

综合以上所论，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融会中西，博采众长；贯通古今，集其精华，而形成一个唯物的哲学体系。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源头有三：

1、接受辩证唯物论。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在其兄长申府（崧年）^②先生的影响下，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经过对比，他认为西方近代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都不如辩证唯物论之博大精深，切合实际。因而令他为之“心折”，从20年代末至今，70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不渝。

2、吸取了西方近代逻辑分析法。张岱年先生坚信辩证唯物论哲学，但不排斥其他西方哲学的科学内容。他十分赞赏罗素、怀特海、博若德的逻辑分析法，并用以丰富他的哲学体系。张先生的哲学，以分析范畴、概念著称，被誉为“分析的唯物论”。

3、继承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哲学。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精深，功力深厚，对宋明以来的张王之学独有所钟。他的哲学体系自称是“接着”张王之学讲，体现出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中国素质和时代气息。

四、冯友兰先生与程朱之学

宋明理学都讲“理”和“气”，都以“理”和“气”作为重要哲学范

^①张岱年著《张岱年文集》第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20页。

^②张崧年（1893—1986），又名申府。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少年中国》编辑，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西方思想文化。1920年与李达等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从事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和1922年，分别在巴黎、柏林介绍周恩来、朱德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后退党。长期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和逻辑。抗日时期全力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9年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

畴。张王之学以“气”为本，而程朱之学以“理”为本。这是两个学派根本区别之所在。

一、程朱之学——以“理”为本

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都根据《易传·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区分形而上、下。程颐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道是形而上。”^①程颐认为，《易传·系辞》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并非指阴、阳本身是道。道非阴阳，阴阳属形而下，不是本；道属形而上，这才是本。他又说：“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在冲漠无朕之中，万物之理（道）已具备。一物尚未生，不是先；一物已生成，不是后，因为，万物之理早已存在。

朱熹的形而上、下之分，继承于程颐。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②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肯定两者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③但又肯定这不相离的理、气，却是两个不同的物：“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一在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④从朱熹分理气为二物来看，他的哲学有二元论的倾向。

但是他又区分理、气两物的顺序为本、次，主、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为本。”“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⑤理既然是

①《程氏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录》。

②《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

③《朱子语类》卷一《理气》。

④《朱文公文集·答刘叔文》。

⑤《朱文公文集·答王子合》。

本，则气为次；理既然为主，则气为从。朱熹哲学，从二元论的倾向，又走向了“理一元论”。

理和气(或事)谁先谁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程颐对此未作明确的回答，朱熹却说得十分清楚：“未有这事，先有这理。”^①“未有天地之前，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②朱熹的“理在事先”说使他的“理一元论”在逻辑上更臻缜密，自成体系。

二、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完成于1938—1946年，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为“贞元六书”。其中《新理学》是冯先生“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总纲。

冯先生的哲学是“接着讲”，明见于《新理学》一书的《绪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宋明理学有三个流派，冯先生是“接着”哪一个流派讲呢？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在《新理学》中冯先生批判清李塨的“理在事中”，他说：“李恕谷(塨)说，理学家(指程朱)以为‘理在事先’而其自己(指李塨)以为理‘即在事中’。若所谓‘在’是存在之义，则理是无所在的。理既不能‘在’事上，亦不能‘在’事中。理对于实际的事，不能有‘在上’‘在中’等关系。”冯先生批判“理在事中”，实为赞同程朱的“理在事先”。在1938年，冯先生在另一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对朱熹的“理在事先”说作了如下的解释：“若按逻辑言，则‘须说先是有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意思是说，理与气的先后，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顺序上的先后。这亦表明冯先生

^①《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

^②《朱子语类》卷一《理气》。